

照料劳动与性别化的劳动政体

佟 新

内容提要 本文将照料劳动拉回到经济与社会分析的框架,新中国建立后实践了将生产与生活相统一的照料劳动的单位体制和将生活与生活相分离的照料劳动的市场体制。市场体制下的性别化的劳动政体是将生产劳动和照料劳动人为分离,将照料劳动分配给女性,微观的照料劳动的女性化构成了宏观的国家经济增长,它以照料责任的家庭化为基础。由此,照料劳动的家庭策略呈现了女性化和市场化特征。为了社会和谐发展,国家应建立关怀经济学的发展战略,建立两性伙伴关系式的照料责任共担,以此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照料劳动 性别化的生产政体 家庭性别分工 家政工

佟 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00871

一、照料劳动是性别化劳动政体的基石

罗素在《婚姻革命》一书的开篇讨论到:“任何社会,无论是古代的或现代的,都有两种密切相联的主要成分:一种是经济制度,另一种是家庭制度。由此也伴随出现了两种有影响的思想学派,一种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源于经济的;另一种则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源于性或家庭的。前者是马克思的学派,后者是弗洛伊德的学派。本文不属于这两个学派,因为在我看来,按照因果功效的观点,经济和性是相互联系的,彼此并不明显地超乎于对方之上。”^[1]在日常生活中,经济和性的相互联系表现为人类再生产的制度安排,包括人类自我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这是马克思的人的两种生产理论。正如恩格斯在《家庭与私有制的起源》中所说,在不存在私有制的状况下,男性的生产劳动和女人的家务劳动具有同等的社会意义,他们共同参与了生存必需品的生产。因此,本文也视照料劳动为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部分,认为应将照料劳动拉回到经济与社会分析的框架。

照料劳动/关怀劳动”(care labor/work)是指为婴幼儿、老人、病人以一切有照料需求的人提供的劳

[1][英]罗素:《婚姻革命》,靳建国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动。照料劳动提供的是与人类再生产相关的服务,而现代服务业也主要是基于人类照料需求发展出来的。照料劳动的工作伦理是基于同情、责任和人类与良好人际关系发展的关切行为。所谓良性的人际关系发展是指给予照料和接纳照料形成的相互支持和互助的社会关系。在良性发展的社会中,照料劳动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照料和接纳照料存在于家庭、社区、学校、企业和政府政策中。

在学界,有关劳动政体的概念源于布洛维的工厂政体,它包括了对工厂体制研究的四个维度,一是劳动过程,即工人在工作现场的直接生产活动及其在此种生产活动中建立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二是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即工人维持自身劳动能力再生产和其家庭生存的方式。这两者是“微观”因素。三是市场竞争;四是国家干预。这二项构成了工厂政体的外部“宏观”因素^[1]。在这一维度下,劳动过程是关注的核心要点。本文认为,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也应成为关注的核心点,因为家庭的生存方式是认识中国劳动体制的核心,强调生产与生活的统一性。性别化的劳动政体(gendered regimes of production)强调生产劳动和照料劳动是人为分离的结果,它将照料劳动分配给女性,微观的照料劳动的女性化构成了宏观的国家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照料劳动的女性化以家庭为基础,依靠性别劳动分工的意识形态,国家干预和市场作用使其固化。

照料劳动作为性别化劳动政体至少包括三方面问题。第一,照料劳动是良性社会关系发展的内在需求,涉及到自我与他人,即提供照料的人要对接受照料的人提供关爱。如对儿童、不能自理的老人和病人的照料,不仅是提供劳动,还需要具有来自内心激励的关怀精神。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将生产劳动赋予了更高的价值,并将其赋予了男性气质,并主要由男性承担。将与人类关怀相关的照料工作视为次要劳动,充斥女性气质,并由女性来承担。这种照料需求和照料责任的分配有重要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性。第二,时间、体力和情感的劳动投入是照料劳动重要的内容。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工作体系中,则出现了与公私领域相关的照料责任分配,表现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区分。如照料老人,在公共养老院中的工作属于有酬劳动,在家庭中的照料则属无酬劳动。借助公私领域划分的区分于劳动回报的差异是照料工作政治经济学的关键点;而这点与社会的性别、年龄、城乡等分工体系相联系,家庭照料工作中的无酬劳动合法地归于女性等。第三,照料责任和照料工作对个人、家庭、社区和政府形成压力,需要各个行动主体使用各类策略实现其责任,增加了各个行动主体的机会成本。在强国家的运作中,经济增长成为首要需求,这使照料责任强加到家庭中,并通过市场手段加以操作。

这就需要对照料劳动进行全面研究,并使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我国对照料劳动的需求呈增长态势。其一,二孩政策的出台将产生大量儿童照料的需求。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13年东城区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发现,老年人能否为子女下一代提供足够的照料资源已经成为影响子女生育决策选择的重要因素。当生育第二个孩子时,老年人照料和儿童照料双重照料重叠交叉,儿童照料资源的供给将越来越成为制约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2]。其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加大了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的比例,护理劳动增加。有数据显示,到2014年中国13.67亿人口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为1.37亿,占比10.1%^[3]。其三,随人均收入增长和居住条件改善,生活质量提升,以消费升级为取向的生活模式对照料劳动提出了更高要求。人类的情感需求正日益变得迫切,并具有合法性。认识和提供为人民所需的照料劳动也正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 Burawoy, Micheal,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London: Verso.

[2] 闫萍:《家庭照料视角下家庭生育决策影响因素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3] 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

第二,长期以来,女性承担大部分的照料劳动,得不到国家承认^[1],不被计入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统计^[2]。正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的劳动性别分工是基于男性和女性比较优势的理性选择,而事实是,当照料责任被分配给家庭而缺少社会支持时,女性要兼顾家庭和工作,这使女性处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地位,她们多数要选择能够兼顾照料责任和有酬劳动的“非正规工作”。有学者称女性因生育导致的收入损失可称为“妈妈税赋”^[3],认为需要重新评估女性照料劳动的价值。

第三,当关注人类生存时,与照料劳动相关的关怀经济学的思想已产生。正如艾斯勒系统地阐述了照料/关怀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的基础应是重视人类的关怀需求和关怀文化,建立伙伴关系(partnerism)的经济理念,即两性共同生产和共同抚育,以实现人类关怀自我、他人和自然的历史转型^[4]。艾斯勒的理论为人类良性社会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但这一理念的实现需要对照料劳动的历史和现实有充分的认识,并要有足够地知识帮助我们认识到照料劳动的性别政治经济学决定了照料劳动分配是不平等地分配给了女性,承认和改变照料劳动的性别不平等分配是实现关怀经济学的关键。

第四,对照料劳动的关注是全球现象。各个国家皆出现了对照料劳动的需求增长,美国的调查表明,当你有足够的钱来雇人为你作饭时,你会雇人吗?有70%的人选择愿意。有数据表明从2001—2008年,美国营利型护理业(hospice industry)增长了128%;非营利型护理业只增长了1%;政府投资的护理业(government-sponsored)增长了25%。表现出照料劳动向外转移,即从家庭移向医院、托儿所、幼儿园等^[5]。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接受了大量的移民妇女进入家庭,从事护理和家务劳动^[6]。2013年,英国外来移民工的前五位工作为植物养殖、清洁和管家、做饭和招待、基本清洁工作和操作工(process operatives)^[7]。照料劳动的性别分工不仅发生在国家内部,还以全球分工的模式出现,使家务劳动商品化。一方面,职业女性面临回家上“第二班”的困境^[8];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职业女性雇佣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做家务,形成了“再生产劳动的国际分工”^[9]。这是对“全球保姆链”的母爱劳动的掠夺性剥削^[10]。台湾的研究表明,存在大量新兴中产阶级家庭对外籍帮工和护工的雇佣,并与社会正经历的阶级、性别、族群交叉的社会问题相融合;女雇主们期待雇佣廉价的外籍劳动力做家务以尽孝道,缓解工作与家庭、传统与现代的压力,形成了日常生活的“屋檐下的全球化”^[11]。国家间的经济不平等既是物质生活条件的差距,亦是儿童照料和老年照料质量上的差距。由此,我们说中国照料劳动的研究和改变

[1][加]董晓媛、[美]沙林:《绪论——女性在家庭和 market 的工作:不被承认、无报酬和研究不足》,载[加]董晓媛和[美]沙林主编:《性别平等与中国经济转型:非正规就业与家庭照料》,[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Beneria,Lourdes: Gender,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3]Grittenden, Ann. The Price of Motherhood: Why the Most Important Job in the World Is Still the Least Value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4][美]艾斯勒,理安:《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高钰、汐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5]Hochschild, Arlie 2012, The Outsourced Self: Intimate life in market times. New York: Pocador.

[6]Hochschild, Arlie 2003,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Intimate Life: Notes from home and wor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Rienzo C (2014) Migrants in the UK labour market: An overview. Available at: http://www.migrationobservatory.ox.ac.uk/sites/files/migobs/Briefing%20-%20Migrants%20in%20the%20UK%20Labour%20Market_0.pdf.

[8]Hochschild, Arlie. 1989.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Avon Books.

[9]Parrenas, Rhacel Salazar. 2001. Servants of Globalization: Women,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0]Hochschild, Arlie. 2000. The Nanny Chain. The American Prospect 11:32-36.

[11]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年版。

的经验可成为全球化时代关怀经济学理想的重要实践^[1]。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第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照料劳动的责任分配在个人、家庭、单位组织和国家间的变化。第二，国家对照料劳动责任的设计和制度安排。第三，城镇家庭对照料劳动的安排是怎样的。第四，照料劳动的市场化的特点，其性别与年龄、阶级和城乡之间的相互交叉关系是如何作用的。本文希望回到日常生活本身，揭示人类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照料劳动是如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

二、照料劳动的国家分配：从单位制到家庭为基础

众所周知，在欧洲发达国家主要是用社会福利制度解决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呈现了照料劳动的公共化；但自2008年经济危机后，国家福利体系面临挑战，并推动了照料责任的再私有化。回首新中国成立后的照料劳动可以发现，我们也经过了以单位责任为主到以家庭责任为主的转型。具体地说：

1. 计划经济下生产和生活一体化的单位体制 建国后，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施了以国家为主体，低水平、广覆盖的生产与生活一体化的单位式社会福利体制，即通过工作单位负担员工的生产和再生产需求。单位制既是组织的权威类型，亦是通过忠诚与庇护关系建立起来的共产党的新秩序^[2]。城市中的工作组织（单位）为职工提供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和养老院等服务。为追求经济超速发展，实行高积累、低消费、“以生产为中心”的发展策略，国家有意识地把性别化分工编织进大生产体制，妇女无酬承担起绝大部分的再生产职责。同时，国家确立了家务劳动和承担者在社会主义生产体制中的位置。女性以女工、农妇、职工家属三种身份参与家内家外的照料劳动^[3]。

以职工家属为例，20世纪五十年代，在集体主义的生产体制中，生产和再生产的结合体现在空间安排上，生产单位有意识地把职工家属组织起来，集中居住，让生活区靠近生产区，以“方便生活、有利生产”。城市里的职工家属被组织起来从事集体性的各类免费或有偿的互助服务和副业生产。家属小区内的互助包括集资建房、储金互助，小区简易托儿站、照料性互助（生病、生育）等。收入型副业生产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类是种菜养猪等农副业生产；一类洗衣缝纫等手工业生产；第三类是在男性职工所在的企业中从事辅助生产，做一些简单的原材料的整理和加工^[4]。

1958年全国增加了三百多万女职工，其中相当大部分是职工家属。在城市民办工业中，职工家属约占总人数的80%以上，成为一支主力军^[5]。职业家属一词具有的双重性，一她们是职工，虽做照料劳动，但却获得了社会身份，具有了“为劳动人民生活服务”的崇高地位。“服务的内容包罗万象，服务的方式灵活多样，而且服务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服务态度是自觉、主动、满腔热情，千方百计，无微不至的。她们大兴团结互助之风，进一步树立了对平凡劳动的光荣感，对服务工作的光荣感。通过她们的服务，使职工体会到，党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大大鼓舞了职工劳动热情和干劲；有利于发挥妇女劳动的潜力；促进增产节约运动更广泛深入的开展。”^[6]以鞍山钢铁公司职工家属委员会为例，1958年有190个家庭提出为厂工作的要求，家属参加工厂生产不久，厂

[1] 佟新、周旅军、马冬玲：《关怀经济学与投资女性——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北京〕《社会发展研究》2015年第2期。

[2] 华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3][4] 宋少鹏：《从彰显到消失：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庭劳动（1949—1966）》，〔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5][6] 杨之华：《序言》，载全国总工会女工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妇联宣教部编：《大跃进中的职工家属》，〔北京〕工人出版社1960年版，第1页，第2页。

里要三班生产,有27名家属因厂里没有夜班托儿所而回家。家属委员会发现这种情况后,向工厂党委反映,党委要求家属委员会想办法解决。家属委员会派人找厂里幼儿园商量,把幼儿园已经不用的便所修理了一下,搭上炕,解决了三班倒女工的孩子寄托问题。家属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幼儿园和一个托儿所,共收托三百多个孩子^[1]。由此,单位体制部分地承担了照料劳动,开办食堂等;部分地改变了照料劳动的性质,保育员、护士、售货员等工作角色似乎是家庭角色的延伸,但有经济报酬。尽管如此,家庭中的照料责任还是女性,即具有双重负担,有学者称这种男性并未承担照料责任的家庭革命是场被延迟的革命^[2]。

值得欣慰的是,通过对中美性别平等观念的比较研究,中国性别分工的平等意识强于美国,但权利平等意识弱于美国。这可能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能够借助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将性别平等观念渗透到整个社会^[3]。这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的单位体制强化了性别分工的平等意识,而非性别间的权利意识。

2. 照料责任的家庭化(去单位体制) 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就是改革生产和生活为一体的单位制,于是照料责任再次转向家庭。政府通过提高人民收入、家庭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将照料责任家庭化,并鼓励家庭的照料责任市场化。

(1)家庭养老责任的建立和国家市场化的资金支持 以养老为例。国家通过建立和健全养老保险制度和养老服务业解决养老责任,建立了具有差异性的城乡养老制度,如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农村、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等。虽然保险水平有差异,但在具体的养老实践上则是建立起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其中家庭养老是基础。

在“居家为基础”的养老政策下,国家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打破行业界限,开放社会养老服务市场,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购买服务、补助贴息等多种模式,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各类养老服务设施”^[4]。2014年,国家“安排资金24亿,支持湖南、内蒙古等8个省份开展以市场化方式发展养老服务产业试点,通过采取中央财政资金引导,按照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试点通过采取中央财政资金引导,地方政府、银行、企业共同出资设立基金平台,按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支持发展居家养老、集中养老、社区综合服务等多种形式、面向基层大众的养老服务产业,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加速、融合发展,探索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支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有效模式”^[5]。2015年,民政部、发改委等十部委发布了《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然而,市场化的机构养老需要大量的护工,按国际惯例,每3位老人需要1名护理人员,这将预示着我国对养老护理人员需求大约在1000万人,且会呈现女性照料劳动的特征。

(2)国家对家政工市场的建构 随着家庭养老及3岁以下托儿所的消失,每个家庭都开始面临养儿和养老的压力。从而使家务劳动的外包制度得以形成,即将照料劳动打包给他人来做,如将儿童照料交给阿姨,实现对劳动的购买。除了从市场购买成品或半成品外,大量的照料劳动实现了外包,象住家阿姨、小时工、洗车工、医院护工等。为此,2001年后,家政服务员工作得到国家承认,被列为正

[1]鞍山钢铁公司职工家属委员会王秀兰:《做好家属工作,支援钢铁生产》,载全国总工会女工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妇联宣教部编:《大跃进中的职工家属》,(北京)工人出版社1960年版,第10-11页。

[2]Rube Hornstein and M.Wolf, 1989. 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朱斌、李路路:《独立与权利:中美女性主义运动与性别平等观念比较研究》,(上海)《社会》2015年第5期。

[4]201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建设(2011-2015年)》。

[5]2014年,财政部会同商务部印发的《关于开展以市场化方式发展养老服务产业试点的通知》。

式职业,指定商务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为行业监管单位,协调支持从业人员培训、积极促进龙头企业建设。2006年,政府大力鼓励家政服务业的发展,以行业协会的方式对各类家政服务公司进行组织化管理。同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将家政工分为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国家职业资格四级)与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所谓“家政服务员”是指“根据要求为所服务家庭操持家务,照料儿童、老人、病人,管理家庭有关事情的人员”。之后各地方陆续成立家庭服务业协会,以“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行为,维护企业权益,提升家政服务业水平”。各省市出台相关行业公约、服务质量规范、中介合同范本等制度文件。

2009年5月,国家建立了由人社部、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商务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8部门组成的发展家庭服务业促进就业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推进家庭服务业各项工作。政府积极表示,学习和借鉴亚洲其它国家的好的做法和经验,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在国际劳工局的支持和帮助下,把家政工的立法、维权、体面就业、促进发展等各项工作做好。2009年6月8日8部门发出《关于实施“家政服务工程”的通知》,“实施家政服务工程,运用财政资金支持开展家政服务人员培训、供需对接、从业保障等工作,扶持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从事家政服务”。

2010年7月29日,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发出《关于组织申报家政服务业体系建设项目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在部分城市开展城市家庭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包括家政服务网络中心建设和扶持龙头企业两项任务。同年9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提出坚持市场运作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原则,明确家政服务是重点发展业态,鼓励各类人员到家庭服务业就业、创业,支持一批家庭服务企业做大、做强。之后《关于2012年开展家政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继续推进在部分城市开展家政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并支持家政服务人员培训。

2015年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等八个单位发布了《关于开展家庭服务业规范化职业化建设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98号),要求“家庭行业服务规范化、家庭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化,是保障家庭服务供给、提高家庭服务质量、促进家庭服务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201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深入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的意见(国办发[2016]24号),将家政服务作为朝阳产业,结合互联网+,推动其作为标准化的新型服务业发挥经济新动能的作用。北京市支持试点企业实行连锁经营、加盟经营,对试点企业投资建设的项目,如门店装修改造、购置相关设备设施、信息系统开发等,按照国家家政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要求,优先给予不超过总投资50%的资金支持。

家政工劳动力市场特点:一是政府出资,即用“政府工程”和“政府项目”的方式投入资金支持和促进家务服务公司的发展和家政工培训。二是服务对象是城镇家庭/妇女的需求。一些地方政府为有失能和半失能成员的特殊家庭、65周岁以上的“失独”家庭提供以小时服务为单位的专业钟点工服务。三是延续了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建构,用户为城镇家庭,提供服务的则是以乡村为主的女性。

总之,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尝试了两种照顾责任制度,一是作为理想型的单位体制,其强调生产和生活的一体化;二是市场体制,其强调生产和生活的分离,生活的责任在家庭,但国家鼓励家庭通过市场方式解决照料责任。下面将重点分析我国市场化条件下照料劳动的实践模式。

三、城镇照料劳动的家庭策略:女性化与市场化

由于市场体制下的城镇照料劳动呈现出家庭化特征,而家庭策略又使照料劳动呈现女性化和市场化的双重特征。表现为计划体制形成的城乡分割关系依然在起作用,一方面,城镇家庭靠家庭策略实现性别间合作分工,妻子更多地承担照料责任,并通过市场寻找家政工的帮助。另一方面,乡村家庭靠家庭策略实现年龄间的合作分工,老年人在家中照料孩子,中青年夫妻进城工作,其乡村女性的

工作之一就是照料劳动,成为护工、家政工和各类服务业。在性别、阶级与城乡的多元复杂的社会结构下,形成了城乡间不同的家庭照料劳动的策略,这是性别化劳动政策的基石。

1. 城镇照料劳动的家庭策略:照料责任的女性化 沃勒斯坦和史密斯指出的,“家是一种世界经济制度”,家可能是最被忽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制度支柱^[1]。家庭将女性无酬的照料劳动合理化,一夫一妻制下的性别分工——女性承担生育、养育等人口再生产责任;男性承担以交换性劳动为主的责任;家庭的劳动性别分工实现了对劳动角色、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在一夫一妻制家庭中实行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形成了丈夫的经济地位高于妻子的差别。家庭内部性别关系的运作是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运作相平行的,都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劳动对妇女的社会意义被提了出来,即妇女要想从性别压迫中解放出来,就要走出家庭,参加社会性生产劳动;还要消灭私有制家庭,将家庭的哺育和照料功能社会化,以消除压迫妇女的土壤。这是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关键,即“阶级社会中妇女地位的关键,在于能否成为社会性成人,社会性成人的身份是由参加社会生产而形成的”^[2]。

1995年,社会学界就“妇女回家”的激烈讨论表明^[3],女性回家从事照料劳动成为市场理性,这亦是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让位^[4];“男女共同承担工作,……破坏了社会的基本分工,瓦解了社会的起码的效率”^[5]等。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支持了新型的家庭分工,家庭发展出多种以女性承担照料责任的策略,“全职太太”、“单身女贵族”和“兼顾工作家庭型”三种类型来应对^[6]。

2010年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表明,男性城镇劳动适龄人口中配偶无工作或从事低收入工作(年收入在12000元以下)的比例高达51.9%;女性相应比例为24%。城镇约有一半家庭由丈夫工作,女性无工作或从事低收入的工作。在未从事有报酬工作的城镇劳动适龄人口中,有58.8%的人是料理家务,这之中女性占94.8%。这些家务包括70.6%的照料孩子、27.4%的照料老人/病人。因照料责任中断工作的约占63%,即家庭照料责任直接冲击了女性就业。城镇双职工家庭,工作和家务的分配以女性兼顾工作和家庭为主。工作日的时间分配是:1、两性工作时间量基本相当,女性工作时间接近8小时,男性略超8小时。女性工作时间是男性的96.6%。2、女性每天做家务的时间接近两小时,男性为45分钟,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约为男性的2.3倍。标准化后的女性家务劳动时间依然是男性的1.76倍。3、家务劳动的分工表现为,女性多从事较传统的家务劳动,第一位是洗衣服、第二位是照料孩子生活;男性从事的家务劳动量较低,第一位的是辅导孩子功课、第二位是家庭的日常采购。

据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表明,1990-2010的20年间,双职工家庭工作日时间分配有明显变化。一是人们工作时间略有增加。2010年,男性工作时间比1990年增长了5.6%,女性增长了6.7%。二是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减少。男性家务劳动时间下降了61.5%,女性下降了51.5%。三是睡眠时间略有增加,各增加10分钟左右。四是两性家务劳动的时间差没有变化。1990年,在职男性的家务劳动

[1]沃勒斯坦和史密斯:《作为世界经济制度之一的家》,见黄光耀、洪霞译《沃勒斯坦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

[2]参见凯琳·萨克斯:《重新解读恩格斯——妇女、生产组织和私有制》,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页。

[3]对妇女回家的讨论有以下论文可参照:李银河:《女人回家问题之我见》,(北京)《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谭深:《谁是选择的主体》,(北京)《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赵慧珠:《“回家”是否是女性发展的合理模式》,(北京)《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3期。

[4]孙立平:《重建性别角色关系》,(北京)《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5]郑也夫:《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北京)《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

[6]方英:《市场转型与中国城市性别秩序分化》,(南昌)《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时间为128.2分钟,女性为258.6分钟,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两倍;2000年,男性家务劳动时间为88.1分钟,女性214.2分钟,女性是男性的2.4倍;2010年,男性家务劳动时间45.1分钟,女性106.9分钟,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2.4倍。这表明双职工家庭的家务劳动量正在减少,但女性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体,两性从事家务劳动的付出时间比没有结构性改变。同一数据表明,城镇已婚中青年女性中,老年照料提供者更难以进入劳动力市场,与非照料者相比,照料者的就业概率会降低29.6%;对男性从事有酬劳动则没有显著影响^[1]。

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2009年数据的分析表明,照料老年人对女性劳动参与存在替代效应。为父母提供照料帮助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了23.8%,其中与父母公婆同住的女性,照料责任使其劳动参与率下降49.08%,农村女性照料活动使其劳动参与率下降28.1%^[2]。

还有另一种情形是年轻的老年人对第三代的抚养。也就是说,照料劳动是有性别和年龄分工的,年轻的老年人承担更多的照料孙辈的责任,以助女儿和媳妇们能参与有酬劳动。独生子女政策的改变增加了母系间的代际抚育,即女儿生育时,其父母来照料外孙子女;而不是传统的由男方父母来照料孙子女。正如2002年中国东部9省的家庭调查数据表明,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明显改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但没有显著改善男性的劳动参与。其背后的机制在于:多代同堂家庭中老年父母尽力协助女儿料理家务,这有助于她们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间^[3]。

总之,家庭策略在性别与代际间找到相互支持的办法,同时也发展出市场化的家务劳动购买模式。

2. 照料劳动的外包——家政工的兴起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至少有2500万人“阿姨”在帮助城镇家庭完成照料责任,她们提供的服务多种多样,如照料婴幼儿、照料老年人、卫生清洁和做饭等传统女性工作。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家政服务业的范围更广,大致分为9大门类近100种服务项目,它涉及家居保洁、家庭烹饪、家庭护理、装饰维修等各个方面。而家政工又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小时工——以小时计酬提供家政服务。二是住家工,住在顾主家,提供照料工作。

截止2010年,北京家政工达40多万人,工商登记注册的家政服务企业近3000家。而中国商务部2015年家政服务行业发展报告也表明,2013年家政服务行业从业人数1800万,家政企业总数60万家。2014年,家政行业从业人数2034万,年增长13%,比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增幅高出7.2个百分点。规模以下企业从业者为58.3%。同年,家政行业企业营业收入2404亿元,同比增加20%。据测算,2014年,家政服务业利润总额173亿元,同比增长11.3%。中国家政市场年产值在2016年或2017年预计能达到20000亿规模^[4]。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2012年统计表明从业者人数更多,2011年的家政工人数已为2477万人,家政行业创造产值近8366亿元,占国内GDP的1.77%^[5]。据笔者估算,除服务于家庭的家政工,再加上在医院服务的护工和以亲属关系及老乡关系从事有酬家庭服务的劳动者,其从业者应在3500万左右,创造产值上万亿。

应该说,家政服务业的兴起妇联起了重要作用,即30多年来,有20多万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通过

[1]马焱、李龙:《照料老年父母对城镇已婚中青年女性就业的影响》,〔北京〕《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2期。

[2]范红丽、陈璐:《替代效应还是收入效应?——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北京〕《人口与经济》2015年第1期。

[3]沈可、章元和郇萍:《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新解释:家庭结构变迁的视角》,〔北京〕《人口研究》2012年第5期。

[4]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2015年中国家政服务行业发展报告》,中国投资指南网:http://www.fdi.gov.cn/1800000121_35_521_0_7.html。

[5]张文范,《稳中求进、创新发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质、有素养的家庭服务队伍》,2012年8月21日在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妇联介绍进京工作,为60多万户提供了服务^[1]。“北京市三八家政服务中心”是北京市妇联的事业单位,是公益性家庭服务机构,为家政人员提供免费岗前培训,免费就业推荐,在家政人员资质审核、就业培训、入户服务、考核评级、维权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同时在劳务基地开发、人员输入、服务管理等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科学的管理方法、规范服务的业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得到了广大用户普遍认可,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充分肯定。此外,2010年妇联的“家政服务品牌”还深入地融入社区,在六城区逐步建立妇联“三八家政”连锁机构,依托“妇女之家”和“社区服务站”设立“三八家政服务站点”。在远郊区县建立“巾帼家政服务示范基地”。以“北京市家庭建设促进会”为平台,配合相关部门并联合一批规范的家政企业,将家政事业做大做强。这其中妇联帮助了城镇工作女性解决了后顾之忧,也帮助了贫困地区的女性找到了工作;但不可否认它也强化了女性和照料责任间的关联,延续了城乡间不平等的体制特征。

有研究表明,在家政工作人员中,女性占比95%以上,她们以城市下岗工人、进城务工农民为主,还包括了少部分从事维修服务的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和从事管理工作的大学生^[2]。据2014年3月,北京打工妹之家发布的《中国家政行业体面劳动现状调研报告》显示该行业存在如下问题:1.家政工超时工作,北京市有59.9%的家政从业人员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2.较低的工资,84.6%的家政工年收入在1-4万元(同年北京市最低工资16800/年)。3.50%以上的家政工认为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4.在北京、广州、武汉地区家政工的社保参保率,不足一半(西安除外)。

汇总家务劳动的市场化,家政工的工作是性别化劳动政体的具体体现。

首先,家政工因其劳动的家庭属性而无法应用《劳动合同法》。如《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的适用范围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的合同关系,家庭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目前有大约三类家政工人的雇佣方式:一是劳务派遣制,家庭服务公司委派家政工到用户家庭提供服务,家政工人和家庭服务公司间有劳动合同关系。这是相对理想的劳动关系,亦是政府力推的用工方式,但很少公司是这一用工形式。二是中介制,家庭服务公司提供中介服务,收取中介费,用户、家政工人和中介机构间有信息服务的关系,服务公司承担一定的培训服务。三是家庭自聘类,用户通过亲朋好友直接与家政工协商,形成潜在契约的劳务关系。家政工的工资按小时或按月支付,绝大多数人没有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有些家政中介公司虽为员工做了工伤保险,但有时难以得到工伤认可,如家政工人因长期劳动过度,导致腰疾劳损,却难以算工伤,又无医疗保障。

第二,以家庭为工作场域的工作环境使家政工与用户家庭的劳动关系复杂多样,特别是住家家政工,她们工作和生活的边界难以区分,甚至存在用户对家政女工性骚扰的可能,当然也有用户诉说家政工的偷窃行为。无隐私的工作和生活是家政工工作的重要特征^[3]。

第三,家政工既处于性别关系和城乡关系的交叉中,又处于三元劳动力市场的底层。所谓三元劳动力市场是指由城乡身份和性别身份叠加构成的等级化劳动力市场,其中高端劳动力市场用制度封闭或排斥低端劳动力,即高端劳动力市场是由高学历或城市户籍劳动力构成的市场,这一市场中的工作相对收入高、晋升机会多;中端劳动力市场则是由学历不高的城市男性或有学历没有城市户籍的女性构成的市场,其市场特征是工作相对稳定,但缺少晋升空间;而低端劳动力市场是以无城市户口、从事弹性工作的女性构成。市场理论强调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价格,但经济社会学则认为,文化对商品价

[1]北京三八家政服务中心网站。<http://www.bjsanbajz.com/web/about/about.asp>

[2]资料来源于中国产业洞察网:《中国家政服务行业发展分析+重点城市市场分析》2014-10-02。<http://www.51report.com/article/3051737.html>

[3]马丹:《私人生活的商品:北京市住家家政工的劳动过程的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2012年。

格起重要的作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加城乡身份的分割借助了性别分工和城乡分割的文化霸权。此外,住家家政工使外来女性有安身之所,这对初入城市的外来女性有重要作用。

第四,城镇家庭利益具有优先性。家政工培训以家政能力为主,政府鼓励妇联、工会和共青团等组织建立家政工培训学校;而对用户家庭则无用工教育。政府虽倡导公司为员工上商业保险,但更鼓励商家获利。为城镇居民服务的家政工制度是性别意识形态和城乡文化霸权的结合。照料劳动不仅是女性化的,还有女性内部的等级化,它用恩赐式将家政服务工作划给了下岗女工、外来的、贫困地区的女性。

第五,对家政工的利益和家政工的家庭需求的忽视,为乡村社会的人口再生产留下巨大的不公平,留守儿童成为有孩子的家政工的心头之痛。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流动儿童达3581万人,其中农村流动儿童达2877万人(流动儿童指流动人口中0-17岁的儿童);留守儿童达6972.8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达6102.6万人(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留在原籍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分别占儿童总数的12.8%和25%^[1]。从这可知,外来家政工的子女应是这些留守家庭的组成部分。

第六,家政工市场不断细化,阶层分化明显,情感劳动的程度提升。有研究显示,高端家政服务业正不断产生。以照料新生儿为例,这本身是项艰苦的工作,因时间的不确定给照顾劳动带来考验,新生儿和产妇护理需要大量的心血和时间。但市场按一系列新生儿养育知识的传播和专业化的职业培训来建构月嫂劳动。服务高收入阶层的模式在家政服务公司的市场品牌建设中被推广,“阿姨来了”(公司)打造“最温暖的阿姨社群和家庭照料平台”,突出服务中的情感输出。

第七,“互联网+”的家政服务业成为新趋势。家政服务的新消费模式正被建构。出现了依特定的性别气质,以O2O(Online To Offline)实时对接和实时匹配的方式提供服务的模式,扩大了传统的家政服务范围。用“美好生活”的用语为宣传工具,打造以女性气质为主的家政需求,如美容、美甲、美体、解压按摩等服务引入生活。“盐城美好生活专业清洁公司”将其家居保洁项目的专业清洁人员称为“美家师”。还有“懒女人也能变美丽”,“58到家”的丽人服务等营造出了年轻人的新消费需要。“互联网+”公司直接提供给用户与家政工交易的平台,招募的劳动者为“合作劳动者”,有意识地将家政工定义为与公司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而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劳动关系。公司为年轻的从业者提供免费培训,提供相应的生产工具,如手套、抹布、清洁剂和带有“58到家”标示的统一工作服装等。在薪酬方面,企业规定了每月最低工时,从业者完成基础工时就能拿到由企业发放、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报酬,订单越多、顾客的好评率越高,就越能够拿到额外奖励。但公司不为员工提供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打造“自由、自主”的就业空间亦成为“互联网+”的家政服务公司重要的口号,并迎合了青年人的现代性追求。

第八,家政工的组织化需要关注。家政工以个体方式进入家庭,她们的利益和需求难以组织化。尽管有些地区建立了家政工行业工会,力图实现市一级家政工工会、家政协会、顾主代表的三方谈判机制^[2],或以其它形式让家政工参与到社区的劳工组织中。但总体上说,家政工的组织化程度还是很低。去组织化的家政工的劳动具有“纯劳动”性质,这是台湾学者对外包制度下“去集体化”、以文化分

[1]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统计司编:《2015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2]郭慧敏:《家政女工的身份与团结权政治——一个家政工会女工群体的个案研究》,[北京]《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6期。

类为基础的“顺从性”劳动关系的解释^[1],它亦能较好地解释照料劳动的商品化是通过家政工的个体化实现的管理。

四、总结和 policy 建议

从社会发展应建立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共同发展,即人的生产和生活共同发展的立场上看,我们不仅应肯定大批工厂女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2]和建筑工人对城镇建设的贡献^[3],也应当肯定女性照料劳动的贡献。我们认为,以国家将照料责任归于家庭,通过家庭策略实现的照料劳动的女性化和市场化构成了中国现当代的性别化劳动政体。

康纳尔指出,父权制是在一系列与性别相关的实践中建构出来的,主要涉及到权力(男人控制女人以及彼此控制的方式)、劳动(分配工作的方式)和关系纽带(cathexis,人与人之间形成依恋和纽带的方式,是一种感情关系的建构)。劳动分工根本上是与谋取利润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生产系统增进了男人的团结,也使得妇女愈益个体化;最终是妇女的亏损积累和男人的利润积累。就这样劳动、权力和关系纽带的相互作用,建构出性别歧视。在家庭中,丈夫的权力是与其职业生涯相联系的,也是与妻子在家庭分工中主要作为孩子抚养者的角色期待相联系的;同时,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授权男人在关系纽带中加强其支配地位;在公共场合,妇女在身体和情感所受到的滋扰,也公开展示了妇女的家庭属性^[4]。

有学者对车间中的性别化生产政体做过全面的论述,表明“男性化的”中国奇迹建立于性别化的生产政体(gendered regimes of production)中^[5]。如后现代的劳工政治应有性别视角^[6];转型中国的服务业亦是性别化的^[7]。市场转型产生了一个性别化的社会结构^[8];性别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将照料劳动的责任分配给女性的性别劳动分工意识形态上。再如工厂体制中农村女工面临国家社会主义、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压迫^[9]。处于与家庭有紧密联系的、在家从事服务业女性、家庭主妇、家政工等受到了女性角色期望的影响^[10]。中国照料劳动的实践体现了市场化的父权制特征。劳动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将照料劳动分配给女性,并通过城乡差异把低收入、乡村女性带进城镇的照料劳动中,女性的照料劳动是中国经济腾飞“被掩盖的一面”,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中国的市场化是不断的家庭财产的商品化,这改变了家庭中的关系,也改变了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有男女平权学者对恩格斯著作再解读表明,“私有制和交换性生产导致了妇女的家庭化和从属地位”。“妇女进行家务性劳动,男人从事交换性的社会劳动,这种两分法的形成,产生了性别的划分,

[1]谢国雄:《纯劳动:台湾劳动体制诸论》,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

[2]任焰、潘毅:《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广州]《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任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3]潘毅、卢晖临、张慧鹏:《大工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Connell, R. 1987 Gender and Power, London: Allen & Unwin, p.112、pp.134-135.

[5]Lee, C.K.1998, Gender and the Social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of Factory Wome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Ong, A.1991, The Gender and Labor Politics of Postmodernity. Annual Review of nthropology 20.

[7]何明洁:《劳动与姐妹分化——“和记”生产政体个案研究》,[北京]《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8]宋少鹏:《“性别”抑或“性别体制”?女性涉腐理论解释框架探析》,[北京]《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3期。

[9]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10]韩会敏:《家政服务性骚扰问题的职业特点》,[北京]《妇女研究论丛》2006年第8期。

它成为统治阶级分而治之、性别统治政策的组织基础^[1]。父权制的等级化的性别关系秩序建构了照料劳动的家庭与市场模式,文化霸权、性别霸权将城乡、阶级和性别的等级具体化和制度化。

实现伙伴关系式的照料劳动的相互支持体系是我们的理想,而不是乌托邦。这是建立在对良性社会关系(和谐社会关系)的追求上,关怀伦理强调对人全面需求的关注,是对善的关系的关注,关怀伦理与公正伦理具有同样价值。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过度强调理性、竞争和效率极大的破坏人类的关怀精神和关怀需求。由于传统的“女性关怀伦理学”是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它要求女性赋予自我牺牲精神的关怀他人、照料他人,这种照料劳动与照料者的自我发展是相对立的,这使照料劳动的提供者/女性与接受者/男性失去了情感联系,照料者自身/女性也与自我失去了联系。伙伴关系型的关怀伦理学强调人与人之间通过照料劳动相互联系,把联系看成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照料者/女性在进行照料劳动时把自身利益融入其中^[2]。

具体的建议包括:第一,重新计量照料劳动的价值。据2000年OECD的调查显示,家务劳动价值在各国GDP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澳大利亚占到58%;瑞士占到52.3%;最低的日本也占了20%。也有学者倡导,我国应当在GDP的统计中加入对家务劳动的统计^[3]。

第二,建立“家庭友好型”的工作和政策环境^[4]。即由政府和组织制定的有利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公共政策,其目的是帮助员工实现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平衡,主要内容包括:家庭关怀性工作计划,如婴幼儿关怀、老人关怀和病人关怀等。以北欧国家在投资关怀性政策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为例,其从普遍医疗保健和育儿到宽裕的父母带薪休假等关怀经济,对普遍提高人民生活、人民的幸福感和更有效能的去创新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关怀伦理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正如美国儿童开发计划所证实的这一公共投资产生了12%的回报,即参加“高质量早期儿童开发计划的”孩子比没有参加这一项目的孩子,一生中大约可多收入143000美元。而加拿大建立的健康与长期关怀部^[5]也改变了人们社会治理理念。

第三,对家庭提供更为实在的社会支持。基于微观数据考察社会与家庭在提供老年照料中的相互作用时发现,社会照料能够每周减少45.84小时的家庭照料时间,替代效应明显。这种作用在不同的人群和服务类型中表现不同:独居老人替代效应更明显,基于社区的照料与家庭照料呈互补关系^[6]。多年来,我国把照料责任更多地给了家庭,但对家庭却很少实质性的支持,这需从税收改革作起,改变个人所得税制度为家庭所得税制度。

[责任编辑:方心清]

[1]凯琳·萨克斯:《重新解读恩格斯——妇女、生产组织和私有制》,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页。

[2]Gilligan, Carol. Hearing the Difference: Theorizing Connection. Hypatia. 1995. 10(2):120-127.

[3]戴秋亮、詹国华:《关于家务劳动产出核算的探析》,[武汉]《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20期。

[4]Patricia Voydanoff, 2005, "Toward a Conceptualization Work-Family Fit and Balance: A Demands and Resources Approach"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7, 822-836.

[5][美]艾斯勒,理安:《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高钰、汐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6]刘柏惠、寇恩惠:《社会化养老趋势下家庭照料与社会照料的关系》,[北京]《人口与经济》2015年第1期。